

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吴心伯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背景,分析了接触政策的特点和实质,指出了克林顿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为标志,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进入务实时期,但要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尚需时日。

迄今为止,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5月以前,对华政策以最惠国待遇(MFN)问题为核心,以人权问题为主要考虑;1994年5月之后,对华政策进入“全面接触”时期,它以经济和安全为重点,同时谋求推进美在其他领域的利益。

一、对华政策的调整

上台伊始,克林顿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继承了1989年以后美国朝野的主流派观点,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主要表现在把“促进改善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

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在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意见时称:“不孤立中国,确保中国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强调,需要在人权和对人格的尊重方面取得进展。”入主白宫后不久,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时,一面表示要继续保持同中国在经济上的“伙伴关系”,一面又强调美国“有权期望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进展。”^①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对此更加直言不讳,他在参院外委会的提名听证会上宣称:“我们的政策将是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努力。”^②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要员在中国问题上公开发表充满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讲话,实属罕见。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自“六·四”之后,即一再呼吁制订全新的美国对华政策,主张同中国进行高层接触,并把改善人权作为每年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先决条件。克林顿挑选洛德在国务院内主管中国事务,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洛德在参院外委会提名听证会上表示要把民主和人权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我们面对的政策挑战是既要与这一重要国家交往,又要促进国际价值观。”^③

克林顿政府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推进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在1993年5月28日的行政命令中,克林顿把延长对华MFN同中国满足有关人权问题的两个必要条件和五个重要条件联系起来。这个决定的特点是:

- A、提出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区别;
- B、附加与人权有关的条件,而将贸易问题和武器扩散问题与MFN脱钩,从而突出了人权问题;
- C、由白宫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提出这些条件,使行政部门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具有更大

的灵活性。

“5·28”行政命令是克林顿对华政策的第一次亮相,显示出以人权问题为核心,以施加压力为主要手段的政策行为。

施压作法还体现在人权之外的领域。1993年7—8月间,美方指控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载有输往中东某国的化学武器材料,派军舰进行跟踪,并达到了登船检查的目的。虽然检查结果表明美方的指控纯系子虚乌有,但美方拒绝向中方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8月24日,美方宣布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对中国进行二级贸易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对华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高技术产品。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上述举措使中美关系在1993年夏天出现了“螺旋式下降”的势头。为阻止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华盛顿首先在手段上改弦易辙,制订了“全面接触”的方针。根据克林顿总统在9月中旬签署的“行动备忘录”,华盛顿指望通过扩大中美高层接触来改善双边关系的气氛,“以更多的谈判,更高层的访问达成的更加广泛的原则也许能够提供双方可以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的环境。”^④

在1993年底和1994年初,中美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接触,其中包括美助理国防部长切斯·弗里曼访华;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美财部长劳埃德·本特森采访,并恢复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活动。据统计,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2月,中美高层接触达8次之多,其频繁程度即使在八十年代双边关系的高峰期也很少见。中美军方恢复接触和两国首脑会晤标志着华盛顿最终放弃了它在1989年之后实行的不同中国进行高层政治与军事交往的作法。

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开始把对华政策的立足点从人权问题扩大到经济和安全领域。华盛顿试图通过强调对华关系的全面性,以降低人权问题的突出地位。克里斯托弗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国有一种全面的关系…这种全面的关系将涉及到我们共同关心的所有方面。”^⑤克林顿在会晤江泽民时则强调中美关系的经济与安全方面:“如果我们共同努力,那就是一支促进安全和经济进步的巨大力量。”^⑥到1994年初,洛德公开承认经济与安全因素在对华关系中的优先性名列第一和第二,人权因素退居第三^⑦。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决定并没有让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它只不过是上述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为1993年秋开始的政策调整划上了句号。将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表明多年来以人权作为对华关系重心的作法已成为历史,华盛顿将谋求同中国发展“长期的、持续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寻求美国在人权、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利益^⑧。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务实时期。

二、调整的背景

推动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有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这些因素对当前和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仍将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首先,同时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媒体的歪曲报道给美国朝野描绘了一幅关于中国的灰暗而消极的画面。然而中国不仅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上也从1992年起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到1993年春夏之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性的国际经济机构已开始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敏锐的美国分析家们很快跟上事态的发展,并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经过一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中国看来正在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可能使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大国”^⑨。中国突如其来的崛起,使1989年之后贬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两个主要

论点——即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需要甚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战略上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显得站不住脚。如何抢占迅速扩大的中国市场和应付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所带来的挑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课题。它促使克林顿政府重新估计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将这一关系置于合理的基础之上。

对华政策还被置于美国亚洲政策的大框架内加以考虑。在亚洲，克林顿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问题：北朝鲜的核计划和同日本的贸易争端。华盛顿认为，平壤发展核能力不仅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挑战，而且也威胁着美国防止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长远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软硬兼施，始终难以突破僵局。中国作为唯一同北朝鲜保持军事关系的国家，被国际社会认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美国要争取中国充分而有效的合作，不言而喻必须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把解决同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列为对日关系的第一优先。美方提出对日本贸易实行“指标管理”的方案遭到日方拒绝，细川首相同克林顿的会晤不欢而散，在美国实行贸易制裁的阴影下，美日关系趋于紧张。一些有远见的美国分析家指出，美国承担不起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恶化的后果；华盛顿分别在政治和经济上同北京和东京对抗，将促使中日两国进一步接近，这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极为不利。他们主张，作为调整美国东亚政策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应以解决 MFN 问题为契机，改善对华关系。

美国以人权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得不到盟国的支持，这也是促使华盛顿改弦易辙的一个原因。冷战结束后，各国的外交政策无不以促进本国经济利益为主旨。为了抢占中国的大市场，一些国家纷纷改善和加强对华关系。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在 90 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并在 1993 年成为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细川首相在 1994 年 3 月访华时表示，西方的人权不应盲目照搬，此语被华盛顿认为是在人权问题上拆美国的台。德国在 1993 年制订了进入亚洲市场的“亚洲政策”。德国总理科尔在同年 11 月对中国的访问中获得了价值 30 亿美元的合同，满载而归。中法关系在 1994 年初恢复了正常。此外，韩国、东盟及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推进同中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无一支持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克林顿总统后来承认，把 MFN 同人权挂钩，“这是我们在没有国际社会合作的情况下单独采取的一个步骤，其他国家都不同意我们的作法。”^⑩这样，如果美国因人权问题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结果将如财长本特森预言的那样，得益的将是欧洲和日本的竞争者^⑪。

从美国国内的角度看，推动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来自商界。中国是美国商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并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全球十大新兴市场之首。近年来，一些美国大公司纷纷调整投资和出口战略，把拓展对华业务列为主要发展方向。这些公司坚决主张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在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相信布什总统会使用总统否决权来保住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商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是间接和不显眼的。克林顿执政后，商界担心他基于竞选诺言而采取强硬立场，于是游说活动从幕后走到了前台。1993 年 5 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有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后，一些分析家指出：“在看来好像是一项外交决定的背后，美国公司已成为新的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⑫为确保克林顿总统在 1994 年 5 月继续延长对华 MFN，商界积极影响公众舆论，大力游说行政部门，并在国会山内寻找代言人。1994 年 4 月，四百多家加利福尼亚公司在给克林顿的信中指出，取消对华 MFN 将危及加州价值 17 亿美元的对华出口以及依赖这些出口工业的 3.5 万个工作。一些与对华贸易有关的议员，如参院少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 (Robert Dole)，来自产麦区的众议员李·汉密尔顿

(Lee Hamilton),来自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参议员约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以及来自波音公司的众议员吉姆·麦克德莫特(Jim McDermott)等,在国会山内扮演了商界传声筒的角色。在关于 MFN 的决定即将作出之前,近 800 家从事对华业务的美国公司致函克林顿,要求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信中警告说:“如果实行经济制裁,就会失去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在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取代我们的位置时,美国在中国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欣欣向荣的市场的竞争地位将永久受到损害。”^⑧十天后,麦克德莫特也向克林顿总统递交了一份有 106 位国会议员签名的信件,回应商界的呼声。克林顿作为一个以振兴经济和减少预算赤字的竞选口号而当选的总统,商界的声音无疑对他具有特殊的份量。

克林顿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也加速了政策调整的步伐。当国务院不断向中方传递如不满足克林顿行政命令所提条件便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信息时,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则发出截然相反的声音:MFN 应与人权问题脱钩。正在积极推进对华军事交往的五角大楼则不希望因人权问题而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决策权因克里斯托弗的北京之行受挫而削弱。3 月中旬,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处理 MFN 问题。经济部门在这个小组的活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⑨。克林顿政府内不同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歧见,是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同利益需求的反映。最后,促进美国经济与安全利益的需要战胜了推进美国价值观的愿望。

国会自 1989 年以后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发挥负面影响。布什政府时期,白宫与国会 在对华政策上发生过多次的拉锯战。白宫易主后,对华政策上的党派因素已不存在,但国会在 MFN 问题上仍持强硬态度。1993 年 5 月 28 日的行政命令即是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妥协的产物。但是从 1993 年夏天起,国会的立场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许多议员先后访华,亲眼目睹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发现中国并不象他们原先所想像的那样一团漆黑,同时中国经济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也使他们认识到美国所能施加的影响有限;其二,由于中美关系在 1993 年夏天出现恶化的势头,国会对施加压力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其结果,是在国会内形成关于 MFN 问题的两党议员的“温和派联盟”,其中包括参议员多尔、波伦(Boren)、凯利(Kerry)、鲍卡斯(Baucus)、布雷德里(Bradley)和约翰斯顿(Johnston),众议员福利(Foley)、汉密尔顿、吉本斯(Gibbons)、麦克德莫特和利奇(Leach)等。这些议员们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有多种利益,人权固然重要,但经济、安全以及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也同样重要;在 MFN 问题上向北京公开发出最后通牒不是最有效的办法^⑩。国会情绪的这一变化客观上减少了白宫调整对华政策的阻力。

当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 5 月宣布给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时,美国思想库中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就对这一作法提出直率的批评。到 1994 年初,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团体出现了抨击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浪潮。3 月 15 日,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关于中国问题的公开听证会,邀请卸任的历届国务卿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其他前政府高级官员就对华政策发表意见。在发言的 15 人中,绝大多数不赞成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前国务卿万斯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集中于同中国的“全面的战略关系”上,并在这个大框架内将对华关系的各个部分摆正位置^⑪。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或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或召开会议,呼吁克林顿政府面对现实,拿出勇气,打破 MFN 问题上的僵局,实现对华政策的彻底转变。

克林顿总统本人态度的转变对对华政策的调整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 1992 年的大

选中,克林顿曾指责布什的对华态度过于软弱。“5·28”行政命令体现了他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但是两个月后,当克林顿结束他的东京和汉城之行时,已开始对自己的行政命令产生疑虑。1993年夏天中美关系的恶化势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疑虑。通过参加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会议,克林顿认识到中国太大而难以惩罚,同时又是如此重要而难以孤立^⑦。克林顿在对华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当总统的经历使他懂得了他作为阿肯色州州长所不了解的一些事情。问题不只是美国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对中国的需要到了什么程度,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同北朝鲜打交道、联合国安理会和核武器扩散——美国需要中国到什么程度。”^⑧基于对中国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克林顿总统以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告别了自己的竞选诺言。

三、接触政策

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秋推出的“全面接触”方针,旨在突破中美关系在MFN问题上的僵局,阻止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政策含义是:同中国恢复因“六·四”事件而中断的高层对话;不把中国看成潜在的对手而导致对抗,而视中国为潜在的伙伴以谋求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面接触”被定义为美国在中国成长为21世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奉行的长期政策,其内涵也大大丰富起来。根据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阐述,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两国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两国同其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在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的情况下,寻求通过对话、妥协和努力把分歧的方面缩小到最小程度来达成共识;在没有共同利益而只有矛盾的情况下,谋求通过对话防止发生冲突,或者把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⑨。

征诸1994年夏天以来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接触”政策的几个特点:

(1)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同中国交往,而在政治上持冷淡态度。加强经济关系不言而喻是要抢占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起飞的好处。促进安全方面的联系则旨在同中国军方确立稳定的交流渠道,了解中国的安全政策、战略构想以及国防现代化实施情况,以防止潜在的“中国威胁”的滋长,促进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目标。政治上,鉴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美方不急于同中国发展密切的政治联系。

(2)保持美对双边关系的主导权。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加上“六·四”之后美对中国的制裁,华盛顿在双边关系中赢得了主动,控制了中美关系的议程。近年来,美方在中国人权问题、MFN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中国导弹技术出口等问题上频频出招,使中方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MFN问题解决后,美方失去了操纵双边关系的一张王牌。但是,华盛顿仍谋求在其他方面“主动出牌”而保持其在双边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确保由美方来决定后MFN时期两国关系的议程。

(3)通过“全面接触”的方针,推进美在各个领域的利益。前几年对华政策因把着重点放在人权和MFN问题上而失去灵活性。现在的积极接触策略则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选择时机,寻求解决华盛顿在对华关系议程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1994年10月通过解除1993年8月的对华贸易制裁,获得中国不出口《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所限制主要参数的地对地导弹的承诺;又趁中国希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国之机,压迫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作重大让步。

(4)平衡推进同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以及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不大可能象80年代那样在同海峡两岸的关系上向大陆一边倒,而是在谋求与北京发展全面关系的同时,以不突破“一个中国”原则为上限,扩大与台北的官方关系,支持台湾

“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这一策略可以使美国从大陆和台湾两边同时得利,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起牵制作用。调整对台政策和允许李登辉访美,就是这一策略的体现。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而非“遏制”,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原因有三:其一,由于美国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而中国要获得威胁美国的能力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美国不应该对中国的崛起反应过度;其二,鉴于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从现存国际体系中获益,所以美国没有必要遏制中国;其三,中美两国在长远利益上有一致之处,使两国通过接触而合作成为可能。从政策操作的层面看,如果一开始就把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加以遏制,那么到头来中国就会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对手。此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都支持同中国接触的政策,没有一个赞成遏制中国,在目前情况下,美国要选择遏制路线,只会孤立自己^②。对华接触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则强调推行遏制政策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佩里认为,遏制将促使中国加快国防现代化,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并增加在北朝鲜、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等地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遏制还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互相关闭市场,并激起中国反对美国带头在联合国和其它多边机构提出的安全倡议^③。

接触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与国际接轨,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是鼓励中国扩大与其邻国的政治经济联系,鼓励中国积极负责任地参加亚太地区正在形成的经济和安全机制^④。

接触政策的基调是对话、合作和诱导,这与遏制政策步步设防、处处对抗的做法大相径庭。但接触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抗。约瑟夫·奈说得很明白,“接触并不排除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的主要国家利益。”^⑤经济制裁、政治压力和战略威慑,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接触政策存在着三个明显的弊端。首先是不平等性。美国希望通过接触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与国际接轨,说穿了,就是要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体系。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其次是主观性。中国作为一个有着 12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其内外政策的制订受制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诸因素。本质上,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是内因而非外因。美国希望以它的模式和政策来影响中国的走向,只能是一厢情愿。第三是不稳定性。接触不是遏制,但不排除牵制。如果牵制仍不能奏效,遏制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近年来,由于中美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频频发生冲突,美国朝野“遏制中国”的声浪日渐高涨。最有诱惑力的莫过于“有选择的接触”或“有选择的遏制”的主张,即在经济上同中国保持接触,而在政治上、战略上对中国实行遏制。事实上,在近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中,不难发现遏制思维作怪的种种迹象。

从中国的角度看,接触政策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但与冷战时代的遏制政策相比,它毕竟还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双边层面上,通过对话和妥协,两国关系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在多边层面上,虽然美国已不能象冷战时期那样对其盟友发号施令,但山姆大叔的举动对西方国家毕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对华奉行接触政策,有助于其他国家正在崛起的中国采取对话和合作的态度,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继续享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外,中国还可以对美方的接触政策因势利导,为我所用,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以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四、对华政策的 问题

克林顿政府难对华政策的制订与施行,受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缺乏有效的协调。由于克林顿总统对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缺乏兴趣,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又不具备主掌外交的才干,对华政策往往为各个部门利益所左右。例如,国防部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军事交往,国务院则强调人权问题,商

务部积极开拓中国的大市场,贸易代表则以保护知识产权为要旨,等等,如此多头并进,导致对华政策出现混乱,缺乏明确的轻重缓急的次序。其次是国会的干扰。1994年的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坛上出现了弱势总统与强势国会对峙的局面。国会山的共和党人在对华政策上频频出击,使行政部门失去主导权,对华政策过多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政策自身的连贯性遭到破坏,屡屡发生政策目标与政策行为相互矛盾的情况。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除了结构上的问题外,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根本缺陷是尚未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同崛起的中国打交道。1994年关于MFN问题的决定只是面对新的现实调整对华政策的第一步,美国决策者头脑中残存的冷战思维和超级大国的霸权心态使克林顿政府以形成一个更加明智、更加客观的对华政策。如何实现对华政策方向性的调整,这对华府的决策者将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挑战。

注:①克林顿 92 年 11 月 19 日在国会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 92 年 11 月 19 日电;克林顿 93 年 2 月 26 日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讲,新华社华盛顿 93 年 2 月 26 日电。

②克里斯托弗 93 年 1 月 13 日在参院外委会提名听证会上的证词,新华社华盛顿 93 年 1 月 13 日电。

③洛德 93 年 3 月 31 日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提名听证会上的证词,新华社 93 年 3 月 31 日电。

④洛德 93 年 11 月 5 日在《世界联播》节目中的谈话,美新署 93 年 11 月 5 日电。

⑤克里斯托弗 93 年 11 月 4 日在参院外委会的证词,新华社华盛顿 93 年 11 月 4 日电。

⑥美联社西雅图 93 年 11 月 20 日电。

⑦洛德是在 94 年 2 月 15 日美国国防大学召开的“太平洋论坛”年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作这一表示的。

⑧安东尼·莱克 94 年 5 月 26 日在白宫特别吹风会上答记者问,新华社华盛顿 94 年 5 月 26 日电。

⑨丹尼尔·威廉斯等:“美国将恢复同中国军方的接触”,《华盛顿邮报》93 年 11 月 1 日。

⑩克林顿 94 年 5 月 26 日答记者问,新华社华盛顿 94 年 5 月 26 日电。

⑪⑫Elaine Sciolino,“Clinton and China:How Promise Self—deconstructed”,New York Times,29 May 1994.

⑬迈克尔·韦斯科夫:“新的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美国公司”,《华盛顿邮报》93 年 6 月 14 日。

⑭“美近 800 家公司致信克林顿要求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新华社华盛顿 94 年 5 月 26 日电。

⑮⑯David Lampton,“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the Age of Finance Minister;Clinton Ends Linkage,”《The China Quarterly》,Sep. 1994,P. 606—607,618.

⑰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Policy impact panel on U. S. —China relations.”

⑱Robert Greenberger and Michael Frisby,“Clinton’s renewal of trade status for China followed cabinet debates, Congress’s sea change”,Wall Street Journal,31 May 1994.

⑲⑳约瑟夫·奈 95 年 10 月 11 日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 95 年 10 月 11 日电。

㉑约瑟夫·奈 95 年 12 月 12 日在亚洲协会华盛顿中心的谈话,新华社华盛顿 95 年 12 月 12 日电。

㉒威廉·佩里 96 年 2 月 13 日在美国防大学 96 年“太平洋论坛”上的讲话,新华社华盛顿 96 年 2 月 13 日电。

㉓哈里·哈丁:“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反应”,95 年 11 月 21 日在传统基金会讨论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 周珉)

(上接第 83 页)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能不能之与不可,其不同远矣。”^⑳此种慨叹,与孟子之谓“不为也,非不能也”又何其相似!

注:①谭嗣同:《仁学上·二十九》。②朱义禄:《试论荀子伦理思想中的若干矛盾》,见《中国哲学史论丛》第一辑。

③④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荀子·性恶》。①①②③④《荀子·礼论》。

⑤《荀子·不苟》。⑥《荀子·非十二子》。⑦⑧⑨《荀子·正名》。⑩⑪⑫⑬《荀子·荣辱》。⑭《庄子·秋水》。

⑮《荀子·性恶》:“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与?”⑯《荀子·富国》。⑰⑱《荀子·解蔽》。⑲《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 573 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⑳《荀子·非相》。㉑《荀子·天论》。㉒《荀子·王制》。

(责任编辑 殷晓蓉)